

● 史学论坛

90 年前的上海 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姚 霏¹ 苏智良²

(1、上海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上海 200234 2、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234)

摘 要: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上海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起航地,也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苦心经营的远东基地、朝鲜革命力量壮大和博弈的舞台以及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海外中转站。上海之所以成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内外交通、对境外人士无出入限制的高度国际化有关,也因为具有宽松的政治氛围、发达的文化传播机制和良好的人力资源。

关键词:20 世纪 20 年代 共产主义运动 远东 上海

20 世纪 20 年代初,正在经历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转型的上海,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内外交通、对境外人士无出入限制的高度国际化以及宽松的政治氛围、发达的文化传播机制和良好的人力资源,成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中心。

苏俄和共产国际苦心经营的远东基地

十月革命之后,俄共(布)与稍后成立的共产国际开始积极向远东地区开展工作。当时的苏俄人员在中国有三个活动中心 哈尔滨、北京和上海。哈尔滨是俄国陆路进入中国的门户,是俄人传统的聚集区,但并非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影响有限。北京虽是首都,但北洋军阀政府对苏俄迟迟不予承认且极

力防范所谓“过激主义”思想渗入,苏俄人员与中国社会主义者接触不易。而上海却因租界的特殊地位和环境,一直作为远东人员信息交汇的中心。同时,又因在内战期间(1918-1920),苏俄与东亚国家联络的主要纽带——海参崴与上海之间已建立联系,且上海法租界聚集了 5000 名俄侨,其中不乏支持布尔什维克并秘密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者^①。中国政府已侦知,“现察沪上现时情状,过激潮流之侵入,已有显著之事实。”^②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几乎毫不犹豫地选定上海作为在远东发起共产主义运动的基地。

1919 年 8 月,成立不久的共产国际开始积极推动远东地区的革命。当时在莫斯科的维连斯基^③和在西伯利亚的加蓬^④分别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在东亚民族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建议书,

^{*} 本课题由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项目(SJ0703)和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S30404)资助。

作者简介 姚霏,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① 时上海人称苏俄侨民为“红俄”,旧俄侨民和白俄难民为“白俄”两派之斗争叫“赤白之争”(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1993 年版,第 199 页)。

^② 《禁止过激主义之院电》,《申报》1920 年 5 月 5 日。

^③ 维连斯基(1882-1942),1920 年任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政治委员,1922 年任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外交使团成员,1922 年秋起从事新闻工作,1927 年被开除出联共(布),1942 年遭镇压,后恢复名誉。

^④ 加蓬(1891-1982),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派驻伊尔库茨克全权代表,兼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副主任。

并得到批准。9月,维连斯基从莫斯科来到伊尔库茨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又于1920年2月前往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负责具体指导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与中国等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和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为避免政出多头,在维连斯基的建议下,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维连斯基任临时执行局主席。中国科的使命之一就是“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①。东亚书记处在上海的建立,标志着共产国际已完全将上海作为远东革命的活动中心。

1920年7月,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成立,下设地区科(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蒙藏科)、总务科、宣传出版科、联络科和情报科,并设有上海分部。同年到达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从东方民族处那里获得了领导中国工作的权力。^②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写给东方民族处的信中谈到:“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③从维经斯基的这封信和东方民族处12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可知上海“革命局”由5人组成,其中3人为维经斯基、陈独秀和李汉俊;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一些小册子;组织部主要在学生中做工作,并准备召开10个地方工会和行会的代表会议。^④中国官府已侦知,“顷据密报,探闻上海俄过激党保的保夫、狄而那夫、渣古克斯宾、破德破夫及华人某某等,于本月16日(1920年10月16日)下午6时,在法界某路盛裕里5号,开秘密会议。”这些俄国过激党人手握大笔钱财,且“该党在沪得华人之援助,举行煽动工人及学生等”。^⑤

为了加强理论宣传工作,维经斯基组建了华俄

通讯社。据包惠僧回忆:“华俄通讯社是维经斯基到中国来首先建立起的工作部门,由杨明斋负责”。^⑥该社设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在北京、广州、哈尔滨有分社。据维经斯基的工作报告称,华俄通讯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信息,内容主要从俄国远东报纸以及《每日先驱报》、《曼彻斯特卫报》、《民族》周刊、《新共和》周刊、《纽约呼声报》、《苏俄通讯》等报的文章翻译而来。^⑦华俄通讯社介绍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出现了与英国“路透社”等西方通讯社相抗衡的另一种声音。据统计,从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华俄通讯社先后在《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140多篇报道。《申报》从1921年1月到1922年1月,共刊用华俄通讯社各类稿件近70篇,每月至少二、三篇,最多的时候有8篇。1921年,苏俄“塔斯社”也在礼查饭店建立上海分社。上海成为共产国际指导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舆论中心之一。

为了加快在远东地区开展革命运动的步伐,1920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前往上海。1921年6月,马林抵达上海,同期到达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上海作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地位日益确立。

朝鲜革命力量壮大和博弈的舞台

在远东,最初的共产主义组织是由朝鲜人发展起来的。朝鲜与苏俄邻近,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流亡在俄境内的朝鲜志士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组织起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1918年1月,旅居伊尔库茨克的南万春等发起成立了“伊尔库茨克共产党韩人支部”。同年6月,原在中国东北地区从事反日复

①《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②[俄]K·B·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百年潮》2001年12期。

③《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④《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5页;《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⑤《预防过激党鼓吹罢工之县函》,《申报》1920年10月26日。

⑥《包惠僧谈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9页。

⑦《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国斗争的李东辉在伯力建立“韩人社会主义者联盟”，后于1919年4月与其他组织在海参崴成立“韩人社会党”，成为远东民众组织的第一个隶属共产国际的政党。9月，李东辉从海参崴来到上海。^①

自朝鲜被日本占领后，上海逐渐成为朝鲜革命和复国志士的大本营。“三一”运动后，大批朝鲜爱国志士流亡到中国，一部分独立运动人士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初到上海的李东辉当即担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韩人社会党总部也迁至上海。1920年3月1日，七百多名朝鲜人和上百名中西来宾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韩人独立节纪念会。李东辉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进行了演说。李汉俊代表中方致词：“贵我两国有不可离之密接关系，而容易行共同动作”，表示支持朝鲜独立运动，还期望中朝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②

1920年5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韩人社会党部分成员组成朝鲜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人为尹玄和金万谦。陈独秀与李汉俊也曾代表中国革命者与朝鲜共产主义小组进行联络。^③

1920年底，共产国际26位执行委员之一的朴镇淳在共产国际“二大”后抵达上海，开始实施“二大”关于东亚革命的计划，尤其是在朝鲜侨民中发展成员，建立革命组织。这一时期，由于韩人社会党政治处负责人李胜万来到上海，并担任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李胜万与李东辉之间的冲突激化，最终迫使李东辉辞去总理之职。1921年1月，朴镇淳在上海召集部分朝鲜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开会商议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宣布成立“朝鲜共产党”。^④朝鲜共产党于同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发表宣言抨击日本吞并朝鲜、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的暴行，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只是社会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民族解放运动是社会革命的前提，为实现民族解放，必须建立武装，主张以苏俄十月革命为榜样，在朝鲜建立苏维埃政府。大会通过新的党纲：消灭私

有生产方式和自由竞争，代之以集中公共的生产分配方式，实施国民义务教育，男女皆有义务从事劳动，为解放妇女实行改造家庭、公共幼稚园、公共食堂、浴池等措施。大会还通过新的党章，选举李东辉为党的责任委员。

1921年5月，朴镇淳撇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自行联络召开了包括朝鲜、中国、日本在内的远东共产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共有13人参加，其中中国人2人、日本人1人，其余均为朝鲜人，代表中国出席的有国民党社会主义者黄介民。朴镇淳的独断行动使远东书记处极为愤怒，当即在伊尔库茨克举行“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宣布解散上海的朝鲜共产党，重建新的朝鲜共产党，并在上海设立支部。新党的上海支部负责人有尹玄、楚统昊、金万谦等原朝鲜共产主义小组成员。^⑤

作为20世纪初朝鲜革命活动中心的上海，见证了朝鲜革命力量的壮大和博弈。

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海外中转站

日本是早期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中转站。1902年4月，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中文版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本中文译著。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和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施存统、周佛海、戴季陶、陈望道、杨匏安等都有留日经历，并利用日本的资料文献深化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但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留学生和中共旅日早起组织成员成为日本社会主义者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桥梁，上海成为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海外中转站。

李汉俊留学日本期间，曾与后来发起日本共产党的堺利彦、高津正道等著名社会主义者接触。^⑥回到上海后，据1919年来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的

①Suh Dae-sook, *Documents of Korean Commu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8.

②《民国日报》1920年3月3日。

③[韩]金秀英：《东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组织集中化和国际主义因素之消亡》，《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稿），2011年6月，第36、37页。

④Conditions of Admission to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ugust 6, 1920, in Jane Degra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Vol.1, p.172.

⑤[韩]金秀英：《东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组织集中化和国际主义因素之消亡》，《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稿），2011年6月，第37-39页。

⑥日本警方1921年4月报告，李汉俊同“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有交往”。转引自[日]石川祯浩注，刘传增译：《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

杨之华回忆,李汉俊曾带她“去日本、朝鲜的进步朋友家”,并“和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方面都有联系。”^①1920 年初,在上海约有 40-50 名日本社会主义者,今天已经没有史料帮助我们确认他们的身份,但仅李汉俊接触的人物就有日本进步人士宫崎龙介、平贞藏、山崎作三郎、芥川龙之介、村田孜郎和泽村幸夫,前两位是追随社会主义的新人社成员。^②

施存统也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颇有往来,多次把他们的著作、宣传社会主义的杂志以及其它印刷品介绍到国内,并与他们一起筹备发行秘密出版物。1921 年 4 月,施存统曾在上海与日本社会主义者讨论即将在上海召开的秘密会议。这次秘密会议即由朴镇淳发起的日、朝、中社会主义者为同共产国际联络和接受资金于 1921 年 5 月在上海举行的远东共产党代表大会。据称当时在上海的日本社会主义者与朝鲜共产主义者有着紧密联系。最终,日本侨民近藤荣藏出席了朴镇淳主持的会议。

1921 年 6 月 29 日,日本东京警视厅总监给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的“外秘乙第 995 号”机密文件以“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为标题,其中提到:“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于明 30 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欲召开同党大会。该大会参加者的各地代表有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等各学生团体及其他联合会会员,日本人亦有参加,眼下在探查中。”^③日本警察不仅对国内社会主义者的活动进行严厉监视,对海外,特别是上海的共产主义活动也予以了高度关注。

1921 年夏秋之际,张太雷带着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马林的使命,秘密赴日与日本社会主义者接

触,传达了请日本方面派人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的邀请。^④10 月 13 日,顺利完成任务的张太雷和日本社会主义者德田球一同行启程回上海。^⑤张太雷的日本之行促成了共产国际与日本社会主义的联系,加速了 1922 年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进程。几乎同时,1921 年 10 月 20 日,携带日本共产主义活动经费的共产国际代表格莱也在上海与日本来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办事机构的日本共产党信使、早稻田大学学生重田要一会面,一同前往日本。^⑥

可见,上海作为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海外中转地的特殊地位。

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起航地

20 世纪初,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发达的印刷出版业,使上海成为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摇篮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港湾。1920 年 2 月,陈独秀带着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计划来到上海,进一步促成上海成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上海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城市,1919 年“六三”运动中,上海工人阶级发挥过巨大的战斗力。来到上海后,陈独秀将研究和动员的方向转向工农大众。^⑦他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工团体进行调查,深入了解小沙渡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5 月,陈独秀郑重推出《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专刊,专门讨论工人问题。据英国驻沪领事馆情报显示,还有一些具有半政治性质的工会,如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工商友谊会和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或多或少处于陈独秀的影响之下。^⑧陈独秀在上海卓有成效地组织劳工运动,使得英国当局认定他

①《杨之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5-26 页。

②韩国国会图书馆编《韩国民族运动史料 中国篇》,1976 年版,第 25 页。[日]宫崎龙介:《寄自新装的民国》,日本《解放》1 卷 7 号(1919 年 12 月);[日]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芥川龙之介全集》第 5 卷,日本岩波书店,1977 年版;[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北京 中国社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3、30 页。

③[日]石川祯浩:《施存统と中国共产党》,日本《东方学报》,京都,第 68 册(一九九六年),第 346 页。

④《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 年 7 月 11 日)》,转引自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版,第 67-68 页。

⑤[日]石川祯浩:《施存统と中国共产党》,日本《东方学报》,京都,第 68 册(一九九六年),第 349、350 页。[日]高屋定国、辻野功译,コミンテルン编《極東勤労者大會——日本共産党成立の原点》,日本合同出版社,1970 年版,第 8 页。

⑥日本《毎日新聞》1921 年 12 月 3 日。

⑦《辩诉状》(1933 年),《陈独秀著作选》第 3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15 页。

⑧ Dispatch no.35 dated 4th February 1921 from the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at Shanghai to the British Legation in Peking, forwarding the Shanghai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the three months ending 31st December 1920, FO 228/3291.

已经是一个享有很高声望、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者,并且对上海的劳工运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同时,陈独秀着手重组《新青年》杂志。他以陈望道、李汉俊等倾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为基础,组成编辑《新青年》的上海同人群体。他还与《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等人建立密切联系,并以之为基础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频繁开展座谈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经验。^①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在其周围初步形成了一个倾心马克思主义的上海知识分子同人群体,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成员基础。

1920年5月,维经斯基携李大钊的介绍信,赴上海会见陈独秀。通过这番接触,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资助,在上海正式展开建党大业。1920年6月中旬,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正如共产国际代表利金指出的:“上海小组具有领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中心组,而且也因为有陈独秀同志参加”。^②李达也认为“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③

8月,上海中共早期组织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书。同时,创办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和推广工人运动经验的《劳动界》周刊。嗣后,《新青年》杂志从8卷1号开始独立发行,仍由陈独秀主编,主要讨论社会主义问题。自此,作为新文化运动核心刊物的《新青年》成为上海中共早期组织的中央机关刊物和中国第一份马克思主义杂志。随后,上海中共早期组织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依托上海发达的文化网络以及便捷的交通条件,《新青年》、《劳动界》等杂志影响

日众,迅速传遍神州大地。除此之外,为了团结、教育、培养进步青年,1920年8月22日,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又于9月创办外国语学社,这是中共第一所干部学校。因此,俄共代表费奥多尔在报告上海之行时感叹道:“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在上海“他们出版一些极其左倾的报纸、杂志和书籍”。^④

上海中共早期组织在陈独秀的领导下,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推动建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是名符其实的临时中央,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中央局。^⑤陈独秀亲自负责武汉、广州、长沙和济南的建党工作。1920年6月,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到沪,陈独秀与他交谈了马克思主义,8月即请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包惠僧忆及武汉小组是在上海临时中央的直接资助下建立的,并强调同上海的关系较为频繁密切。^⑥从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早期组织,并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组织。在各地中共早期组织相继成立并以上海为中心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构想已逐渐酝酿。5月,上海中共早期组织委托包惠僧到广州找陈独秀,请他回沪或将上海中共早期组织迁往广州,但陈独秀认为广州到处是无政府主义,政治环境不利,地理位置也不适合,不便于各地联系,仍属意上海。很快,便有了中共一大在上海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政治和文化环境,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航地。

①参见李涛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7、168-169页。荷兰学者方德万(Hans J. van de Ven)亦认为,以陈独秀为中心聚起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深感兴趣的上海知识分子小圈子,后来的上海发起组即从这个知识分子小群体中产生。参见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59.

②《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摘录)(192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③《李达自传》(节录),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④《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⑤《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摘录)(192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⑥包惠僧《回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拥有远东独特地位的上海

上海,之所以能成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在远东的特殊地缘政治有关。共产国际“二大”后,与远东国家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成为共产国际最重要的课题。在远东各国中,日本尚不具备爆发革命的直接条件,朝鲜则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且国家太小,影响有限。只有中国是世界人口和资源大国,其一举一动影响到整个远东的局势。当时的中国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下,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薄弱环节,日益加剧的内部纠纷又孕育了爆发苏维埃革命的火种。如果能推进中国革命并取得胜利,就能打破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包围和封锁,改变苏俄孤立的国际处境。所以,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低落的情况下,中国革命就具有了接替西方,支援苏俄革命和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和意义。

而在当时的中国,东部沿海的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内外交通和对境外人士无出入限制的高度国际化,成为吸引远东共产主义运动于此汇聚的重要条件。继伊尔库茨克、海参崴之后,新的远东共产主义运动中心呼之欲出。当然,上海得以成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中心,还取决于以下条件:

首先,20世纪初的上海具备了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所必需的宽松的政治氛围。

上海开埠于1843年。1845年,英国殖民者依据《土地章程》设立英租界,1848年美租界建立,英美租界于1863年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与此同时,法租界也于1849年宣告建立。两大租界在19世纪余下的半个世纪内不断越界筑路、渗透扩张,逐步完善各自的市政管理机构。这样,上海出现了“一城三市(政府)”的格局。租界既是中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耻辱象征,又使生活在其中的民众得以在外国势力的庇荫下免受军阀或专制政府的骚扰,并躲避连

绵不断的天灾人祸。到20世纪20年代,以租界为特征的上海成为中西文明共存、竞争、融合、多元的世界性大都会。正是这样多轨异质的政治环境,为多元的政治思想和革命活动提供了舞台。以法租界为例,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使其成为各类革命活动的理想地点。1919年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法租界中长期开展活动,生活在法租界中的俄侨为维经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掩护;而直到1922年底,上海共产党的绝大部分活动都在法租界内运作。与租界外其他地区严酷的政治环境相比,法租界是一个较为开放、自由、讲究法治理念,尤其是“提供政治避难”的区域。^①这是上海能成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主要原因。

其次,20世纪初的上海具备共产主义运动所需的发达的文化传播机制。

近代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也是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中心。从1912年至1926年,上海出版的图书占全国的70%。^②20世纪初的福州路“文化街”聚集着300家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和书店。^③文化的“工业化”初步奠定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文化与舆论中心的地位。到1917年,《新青年》的发行量已由最初的每期1000份增加到15000至16000份。^④依托着上海文化和舆论中心的优势地位,《新青年》将思想启蒙的理念传布到神州大地。可以认为,近代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早在19世纪末的上海,由西方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就首次介绍了马克思的主张。^⑤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第一个报道这一重要消息。^⑥而在五四前后最早介绍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星期评论》,除《新青年》的编辑部一度在北京(发行部则在上海)外,其余三种都是上海的刊物。1920年2月,《新青年》杂志复归上海,既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本身的转向,也意味着上海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引介和传播的主要中心。透过近代上海的印刷出版

①参见 Wen-hsin Yeh,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212-214.

②“国史馆中华民国史文化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文化志》初稿,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第166页。

③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7.

④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⑤《万国公报》1899年第123期。

⑥《民国日报》1917年11月10日。

网络,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深入地传播开来,由此培育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再次,20 世纪初的上海具备共产主义运动开展的人力基础——觉醒的工人阶级和先进的知识份子。

开埠以后的上海迅速由一座江南县城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首都。1865-1936 年间,上海对外贸易占全国的 45%—65%。金融产业也在外资的引导下逐渐壮大,民国初便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而随着现代制造业的产生,到 1922 年,上海近代工业门类增加到 32 个。^①伴随工业化的进程,城市人口亦快速增长。到 1920 年,上海人口达到 229 万,排名第二的天津人口为 77.5 万,尚不足上海的一半。^②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深入发展使上海的社会结构出现分化,新的城市社会阶级逐渐崛起。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生机勃勃的工业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发展壮大。依据 1920 年《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上海劳动状况”的资料,全国工人队伍发展到

194.6 万人,其中上海有 513768 人,占全国工人总数四分之一。随着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阶级斗争亦表现得愈加公开化,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同时,文化繁荣与政治气氛自由的上海成为新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诚如鲁迅所言:“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零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③相形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要宽松的多,中外联系广泛,再加上文化事业发达,自然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中心。受过教育且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成为最有热情推动社会变革的行动者。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彷徨无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与视野,加速先进知识分子投身到远东共产主义事业中去。

①龚骏《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商务印书馆,1931 年版,第 30—32 页。

②李竞能主编《天津人口史》,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82 页。

③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5 年版,第 132 页。

(上接第 110 页)

2、中国大陆留学生已成为新移民的重要后备力量。这是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年龄结构呈现年轻化的主要原因。由于澳大利亚海外教育的产业化趋向,中国赴澳留学生近年不断增加,截至 2009 年 6 月止的一年内就有 14.6 万名中国学生留澳,留学澳洲成为居留和移民的跳板。但 2010 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对移民职业的收紧,将可能导致未来留学生数量的大量减少。

3、华人新移民到澳分布地区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以悉尼为首府的新南威尔士州和以墨尔本为首府的维多利亚州仍然为首选。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局对 2006 年以来中国移民的分析,36%的技术移民倾向于居住在维多利亚,53%的家庭移民、41%的留学生和 33%的长期商务移民选择居住在新南威尔士。这反映出澳大利亚的经济较发达地区,对技术移民的需求和吸引力要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和教育资源的分布情况,从而形成了华人新移民在澳大利亚的聚居模式。

4、从教育背景和从事的职业来看,近年来,来自香港、台湾的华人,受过专业训练,英语流利,教育资格得到澳洲政府的承认,他们逐渐进入专业与白领职业范畴。而来自中国大陆及印支华人因相对英语较差,有些学历又得不到澳洲政府的承认,他们往往要重新获取学历,才能进入高新技术行业,或从事技术性不强的职业。由于职业的差异,来源不同的华人新移民经济收入悬殊较大。

5、华人新移民的整体就业率和工资收入水平还不高,经济和社会特征出现了二重性特点:即一方面从事高级白领职业者占有了较高比例,如在医疗、财会、管理、审计、计算机等专业岗位,华人新移民就业者较多。但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华人在从事低收入的蓝领职业,如餐饮业仍是吸收华人的传统的主要行业。华人新移民的失业率远高于澳大利亚的平均失业率。